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一

(65)大学生社会实践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

废品站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经过4年的含辛茹苦，湖北省浠水县青年农民张双克在武汉一家个体废品站边打工边攻读，终于圆了他渴望已久的“大学梦”。7月下旬，他顺利通过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贸易法专业93成教班的全部结业考试，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

一、家境贫寒 求学路艰

今年24岁的张双克，出生在一个贫寒而不幸的家庭。他不满两岁时，母亲就病逝了，父亲有一只眼睛先天性失明，他和哥、姐3人自幼就备尝了生活的艰辛。

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他就帮父亲下地干农活，上山挖药材、砍柴禾，每次将换来的几角钱积攒下来交学费读书。上初中的学费，就是他一个暑假每天上山砍柴换来的。初中三年，他学习用功，成绩优异。哪知中考前夕，他朝夕相伴的姐姐在池塘洗菜时落水溺死。他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抱着姐姐冰冷的尸体嚎啕大哭……那一年，他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

从进入高中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以勤奋来回答命运的挑战。每天天没亮，他就起床在教室里点煤油灯攻英语，晚上下自习后继续挑灯夜战。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保持前列。高一快结束时，他向父亲要15元钱，想订一本《现代中学生》高中版。“家里买油盐的钱都没有了！”父亲向他发出无奈的叹息。望着父亲那瘦弱的身躯和粗糙的手，他心里一阵酸楚。念完高一后他被迫退学了。

在家里，他白天帮父亲耕田种地，夜里看书学习，家里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

他决心去闯一闯山外的世界。1992年4月28日，他带着冒雨借来的50元钱，只身来到陌生的武汉市。

二、打工艰辛不忘自学

初到武汉，举目无亲。口袋里只剩20元，还有5本书，全是高一辍学时的课本。

他在街上到处走，希望找到一份活干。饿了，就买一角五分钱一个的硬烧饼啃；渴了，就扭开自来水笼头喝生水；累了，就找个人少的地方躺一躺。跑了两天后他发现：自己既没有武汉市户口，又没有高学历，身材还比较矮小，要在武汉找一份工作实在困难。而兜里的钱已所剩无几了，他感到生存的威胁迫在眉睫。

总不能饿死吧！无奈之中，他只身加入了拾垃圾者的行列。一个叫涂道玉的废品回收站老板看他年纪轻轻，穿着破旧，就问起他的来历，随后同情地将他留下来打工。

废品站里的活儿可不轻。每天，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废旧书报等着他分类整理，然后捆成捆，打包装车。一天下来，他浑身没有一处不酸痛，一躺到用黄纸板铺的床上，动都不想动了。第二天，他还要照常早起，做饭、打水、扫地、洗衣服，干各种杂务。农忙季节，他还要帮家在郊县农村的老板割谷插秧。

但他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只要有空，他就从废旧书报里找书看。废纸堆

旁，黄纸板上，路灯下，都成了他读书的好地方。《周恩来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列宁、鲁迅的著作等等，这些从旧书堆里捡出来的书使他爱不释手，看后还认真作笔记，写心得。《周恩来传》增强了他战胜逆境、迎难而上的信念，他在笔记中写道：“重要的是他告诉了我人生的真谛，使我突然清醒起来，不断地反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应该做些什么？这样的书是不可能过时的。”

光看旧书不够，他还从每月 80 元工资里挤出 20 元左右买书。在劳动间隙，武汉的几家大书店他几乎都跑遍了，连 260 元一套的《中国审判实务大辞典》、160 元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他也舍得买。

4 年下来，他将自己打工收入的一半——近 5000 元花在了买书上，共读了上千本书，仅笔记就做了厚厚的 40 多本。今年他被推荐参加武汉《读书之星》的评选。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废品站老板深为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特意在废品站里临时搭了个小阁楼供他自学。这间 8 平方米左右的屋子几乎被书桌、书架、卧床三大件占满了，桌上、床上、书架上到处摆满了书，文学的、政治的、法律的、英语的，种类繁多，都码得整整齐齐。四壁上，贴着记有各种复习题的白纸，学习计划表及“勤奋”、“拼搏”等大幅字画……

三、梦圆武大奋斗不息

张双亮并不满足于在废品站里的自学，他渴望跨入高等学府的知识殿堂接受洗礼。

1993 年 9 月，他赶到珞珈山麓的武汉大学成教学院，表达了自己求学的愿望，因为不是应庙高中毕业生，还没说完就被断然拒绝了。他没有气馁，不久又到武大，诉说自己的身世处境……直到第三次，他火热的求知欲终于感动了成教学院的领导，他们破例接纳了这位风尘仆仆的学子。接过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张双亮眼中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第一年他在武大住读，只在星期六、星期天回废品站干活。他自知基础比别人差，每天早晨 5 点就起床，参加锻炼，5 点半开始到宿舍楼顶上大声朗读法律条文理论，到教室预习、上课、整理笔记、看法律资料、上自习。除了吃饭、睡觉外，他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

他在学校租住的小宿舍里，贴满了记有法律名词解释、案例分析、论述题的白纸。较难记的论述题，他还用粉笔写在水泥地上或门上，随看随记。

1 年后，因学费困难不住读了，他上完课后就急匆匆赶回废品站干活，晚上再抓紧时间补习功课。武汉的夏夜酷暑逼人，他住的小阁楼更是如同蒸笼，黑蚊成群。为了免遭蚊咬，他不得不穿着长衣长裤扎紧裤脚看书，每次不到半小时就全身如同雨淋，他咬着牙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天夜里，又困又累的双亮刚背完几道论述题，又拿起书看，突然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从床上一头栽下来，额间上摔得鲜血直流，至今留有一个疤。

有时打包到深夜，第二天又有课，他怕睡过头就干脆不睡觉，踩着自行车从几十里外过江赶到学校。到达时，武大校园还沉睡在梦乡中，他就是在晨曦微露时在林子里摊开书本……

在武大成教班的 3 年里，他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没有钱交课本费就向同学借课本抄；没有钱乘车回汉口，就从武大步行数十公里回去；甚至有时没有钱吃饭，就喝开水充饥……

严冬过去后是春天。今年7月，他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虽然只是大专文凭，但他说：“学到的知识是无价的。而且，这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是用劳动和血汗换来的！”

村里来了大学生

农家的孩子考大学曾经被形象地称为“跳农门”，意谓可以改变自己农民的命运了。如今，在上海市南江县周浦镇，却有5位农家大学生重新回到农村——他们是周浦镇为培养年轻干部推出的新举措之一。

去年9月，大学生钱学军、赵龙安、俞佩华、王健红、邹月华离开了原来的周浦镇农业公司，在镇党委的安排与关心下，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分别到5个村去“挂职锻炼”。

1年时间到了，这5位大学生在村里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周浦镇党委的良苦用心可有所得，上海的农村到底需不需要大学生，需要怎样的大学生？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特地到周浦镇采访了镇党委领导、村支部领导以及5位大学生本人，收获很多，也给人以很多启示。

一、镇党委领导进大学生

周浦镇近几年依托其原有的经济基础和浦东开发、开放的东风，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一切对镇、村一级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经验型、实践型的农村干部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尤其是村一级的干部，普遍存在着年龄大、学历低，青黄不接的状况。为此，周浦镇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引进大学生来改善和充实村一级的干部机构。

周浦镇党委副书记张水龙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选择这5位大学生深入到村里去锻炼，希望能通过几年的基层锻炼，有几个脱颖而出，成为镇、村干部的接班人。1年多时间看来，这5个大学生确实各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两人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作为村这样的一个基层机构，与企业、事业单位不一样，是一个小社会，大学生如果能把自己‘沉’进村里，对自己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这一点他们现在也很有体会。我们提供机会与舞台，关键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正值全镇村组班子调整。作为对1年挂职锻炼成效的检验，镇党委大胆地把5名大学生放到村班子候选人中，结果，大学生们全落选了；虽说是落选。但他们票数都不低，钱学军的票数仅差2票就能当选。选举时，不少村民提出，现在时代进步了，村里需要大学生来当主任，带来一些新的观念、思路、信息。也有村民指出，现在村里发展经济，更需要大学生来“施展拳脚”，大学生到村里是有用武之地的。

这一次选举，也给镇党委带来不少信息与思索。当初大学生到村里，为慎重起见，说是“挂职锻炼”，实际是在探索走一条培养村干部的新路子。现在反馈表明，村里是需要大学生的，大学生在村里是有用武之地的。所以，镇党委决定对这5名大学生跟踪培养，同时考虑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大学生到村里去。

镇党委几位领导松了一口气：“第一炮打响了。”

二、村支部领导用大学生

考虑到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这次大学生去的5个村子都是周浦经济发展快、村领导班子力量强的先进村。

大学生的到来，村干部们都表示很欢迎，但又有些担心，担心大学生不适应新的环境，或者是好高骛远，小事不肯做，大事做不来。尤其是作为镇

里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任务，做不好还不如不做，这是初始许多村干部的担心。

但是，大学生们以自己的言行做出了回答。

大学生钱学军所在的里仁村党支部书记冯明玉对小钱是“放心、称心、又高兴”。冯明玉40岁出头，在村班子里是最年轻的，对后继无人的问题他也是不无担心。小钱也是谦虚好学，进步很快。去年村里的征地劳力安置工作，他主动承担，一家一户地跑，宣传政策，解释法规，耐心而细致，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现在，村里成立了一家实业公司，小钱也跟着冯明玉开始涉足“商海”，劲头十足。冯明玉讲：“村班子7个人，小钱是第8个，我们开会都叫上他，听听他的意见。”现在，小钱在村里也是如鱼得水，和大伙关系都处好。轮到他值班，村干部们会叫他到家里来，吃点心、吃馄饨，关切之至。大家现在都担心，刚一熟悉，小钱就走了，于是就开玩笑说给他在村里找个对象“留”他下来。

赵龙安到了横桥村挂职锻炼。村支书钱桂芳是优秀党员，市三八红旗手，很器重小赵，说他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小赵人灵活、聪明，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去年9月底，村里农民造房测量地皮，小赵积极参与，吃得起苦，为人随和，一下子和村干部们打成了一片。村干部们的辛苦，小赵也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很敬佩村干部们吃苦耐劳，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今年，他写了入党申请书，钱桂芳高兴地做了他的入党联系人。

横桥村村委会副主任康德林说出许多村干部的心里话：“我们都很欢迎大学生，但是希望是像小钱这样朴素、实干，对农村有感情的大学生。”

三、大学生谈“大学生”

赵龙安1991年从上海农业学院农业机械专业毕业后，分在农业公司。天天一杯茶，一张报，日子久了，难免觉得心里空空的。钱学军在农业公司搞植保，除了农忙季节，其余时间也是晃来晃去。两个人有时候在一起聊天，都觉得怅然若失。5名大学生作为后备干部下到村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战胜了挑战，无疑就抓住了机遇。

虽然5名大学生都来自农村，但他们到村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真正体会到村干部们的甘苦。

王建红刚到牛桥时，正碰上村里人口握样调查。白天不少村民家里没人，只能晚上去，小王就和另一个村干部骑着自行车，一家家跑。村里近90户人家分布比较散，常常要到晚上八、九点到家。她说：“从前老听人讲，村干部如何如何，现在接触下来，绝大多数村干部都是为村民着想，工作很负责，很认真。”现在，24岁的小王已经是村里的专职妇女主任了。

俞佩华到了周南村，也以能吃苦、实干为村领导所称道。7至9月份正是植保期，她跟着村干部们早上4点多就起来干活，不喊一声苦。现在，村里写写弄弄的任务也全交给她了。镇组织委员陈燕有一次看到周南村交上来的一份材料，条理清晰，文字漂亮，与以前不一样，一问，才知道是小俞写的，不由得感叹一句：“到底是大学生。”

赵龙安对记者讲：“如果一毕业就到村里，那就可以帮村里多干些事了。”记者问他：“你一毕业就到村里，当时就愿意吗？”他笑了。

有一次村里很多人来问大学生小赵：“股份制是怎么一回事？”小赵一听，傻了眼。于是，他回家看了许多有关方面的书，第二天再去讲给村民听。

这件事给小赵触动很大，学历不等于知识。村里原本要办一个高科技的大企业，由于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原因“流产”了。“大学里的那些农业机械知识实在太有限了。”这是小赵到村里工作后的切身体会。

与小赵有同样体会的还有钱学军，现在他已向第二外语进攻了。他说：“上海市的农村与一般农村不一样，像我们里仁村农业优势正慢慢失去，第二、第三产业在大力发展。大学里的专业知识已经远远不够了，新的发展形势需要我们具备更多的素质，不断更新知识，了解信息，才能适应现在农村的发展。”

村干部的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也给大学生们以很大教育。

小赵坦言，要不是碰到村支书钱桂芳，他是不会这么快写入党申请的。另一个写入党申请的是小俞，她说，许多村干部、基层党员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大学生学习的地方。

我们期待着这些大学生不负众望，在村里有更大的发展，为村里的发展奉献自己的才智和青春。

大学生与流浪儿

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成教 106 室挤住着 10 名学生，有一位又矮又瘦，只有 10 来岁。他是早慧的大学生吗？

武汽大计算机系 95 级学生黄旭初告诉笔者：这位少年是离家出走 1 年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流浪儿”。

一、三次流浪

1996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2 点多钟，从随州市返校的黄旭初正在 333 次列车上喝着饮料，突然发现对面站着一个 10 多岁、瘦瘦的男孩，他右下额上有一道伤痕，裤裆裂开了一条大缝，肮脏极了，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黄旭初连忙停下来，问：“喝水吗？”

小男孩点点头。

黄旭初把健力宝递给他，又从包里拿出一袋蜜枣。小男孩就着饮料，一会儿就把蜜枣吞进肚里。有一颗嵌在牙槽里，他就把手伸进嘴里抠。

小男孩叫李征，家住天津东丽区福阳西里 2 门 505—506 号，父亲李为彩是天津车务段军粮城火车站道口员，好酒，酒性一发，就摔碗。父母经常吵架。李征 6 岁那年，李为彩离婚再婚。

然而家里仍是吵、吵、吵，与以前不同的是，“家庭战火”的导火索不再是李为彩摔碗；而是李征——那位带了一个女儿的后妈不喜欢他。

“他们吵架的原因在我，我走了，他们就不会吵了。”在那里的一个夏夜，李征悄然出走，慌乱间爬上了一列火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浪。

不久，李为彩在郑州车站找到了李征，将他送给河南兰考县乔左农民王友豹做“儿子”，并改名“王光”。在这个新家里，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王光在新家上了学，养母一餐只给他吃一个馍。有一次，哥哥跟同学打架，王光给劝开了。回到家，养母怪他没帮哥哥，对准他的小腿骨就踢，并恶狠狠地骂：“要你有什么用？白吃我的饭！”

李征决计回天津。前年的一天，他又溜出来了，却在郑州上错了火车，到了西安。一位好心肠的人又将他送回天津。

他一回来，家里重开战火。李为彩让他重回兰考。

李征又成了“王光”。新家不再让他上学，一餐只给他吃一个馍。他要跟着大人下地，一弯腰，金黄的麦子就把他遮没了。晚上回到家，他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他的哥哥姐姐却在灯下写着作业。

1996 年春节前，王光趁养母下地干活，偷了 70 块钱，开始了他第三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流浪。

1 年多来，李征足迹遍布北京、上海、湖北、四川、新疆等地，他混迹于车站、码头、街头……靠乞讨、捡酒瓶卖钱为生。

二、“大哥哥”与“小兄弟”

黄旭初决定把李征带回学校。在给李征洗澡时，那一根根突出的肋骨刺痛了黄旭初。吃饭时，黄旭初坐在他身边，为他深饭，他狼吞虎咽地吃了 5 碗！晚上，黄旭初为他缝补衣裤，用当家教挣来的钱为他买来鞋袜，后来又从家里带来一条灯芯绒上衣和一条新棉裤。

与黄旭初同屋的都是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得知李征的来历后，热情地接纳了这位“小兄弟”。上街办事，大哥哥们带着着；学校组织文艺活动，他们带他去猜谜；就连小兄弟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尽量去满足，因为他们想到“小兄弟”从小失去了家庭温暖。

李征也许没想到，从知道他的情况那天起，大哥哥们就为他担忧：才 10 多岁就辍学，将来怎么办？送他上学，大哥哥们无能为力，他们就施展“家教”本领，从 ABC 开头，教他背英语单词，学简单对话，每天督促他写日记。

在小兄弟的日记本上，记有这样的流水帐：

“一大清早，我大哥（黄旭初）就起床了，给我买了三个 MO（馍）和一袋咸菜，然后就去上学去了

小兄弟很聪明，在大哥哥们的督促下，进步很快，26 个英语字母和一些简单对话，3 天就学会了，用英语数数，能数到 100 多。

但对于“小兄弟”偶尔暴露出来的江湖恶习，大哥哥们也绝不姑息。

去年秋天，李征在去西安的列车上，认识了一位回家探亲的解放军叔叔。叔叔带他到河南项城孙店住了 3 天，送他走时，同他约定，元月 4 日两人在郑州亚细亚商场门口见面，再带他到部队去。1996 年 12 月 29 日，小兄弟嚷着要去郑州与那位不知名的解放军叔叔碰头。正是月底，大哥哥们手头紧，但仍凑了点钱让他去郑州。谁知当天下午他又回来了，声称大哥哥们给的钱他买东西吃了。细心的黄旭初发现他手上很脏，留有打游戏机的污迹。当晚，一位女同学证实了黄旭初的猜测。

怎么能撒谎呢？黄旭初拿起一本书就要打他，但他打在桌子上。他罚李征站了一个小时。

三、“长大了要考你们学校”

有人问李征：“你爸爸呢？”李征回答说：“我没爸爸，我只有一个大哥（黄旭初）。”在 1 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征与他的大哥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大学生宿舍终非久留之地。1997 年 1 月 7 日晚，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与李征父亲李为彩取得联系，李为彩在电话中以“工作忙，走不开，李征回来后又引起家庭不和”为由拒绝认领李征。15 日，校方与李为彩所在单位领导取得联系，他才不得不过来武汉领回李征。

在李征临走的前一天，黄旭初为他画了一幅头部素描，素描右上角写“1996 年 1 月 14 日留念”字样。李征和黄旭初同枕而眠，他拉着黄旭初的手说：“大哥，你摸一摸，我是不是长胖了？”

黄旭初摸着胸前肌肉，说：“是，你是长胖了。”

“我不想回家，回了家，家里要让我摆小摊。我想读书，长大了，就考你们学校。”同寝室的人都睡了，他们俩却一直聊到凌晨 2 点。

列车带走了李征。学校奖励黄旭初 200 元钱，《楚天都市报》以整版篇幅报导了他的事迹，但他并不看重这些。“我担心李征回去后，家里不会让他上学，”黄旭初低声告诉记者，“他父亲临走时曾说，要好好待李征，让他读书。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大学生扫厕所

大学生扫厕所成为 1996 年热点好新闻，是大连理工大学师生们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新学期一开始，大连理工大学为提倡自立、减轻家长负担，千方百计为学生找些劳务来解除后顾之忧，将水房和清扫厕所等活转交给大学生们来做。可是唯独很少有人报名扫厕所。这时，一个大学生站了出来：“我报名清扫厕所。”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场的同学都不由得将惊讶的目光投向他。在一般人的眼里，大学生是应该干高层次工作的，怎么能去扫厕所？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位学生就是共青团员、该校化工学院 9506 班的李祥华。

一、“苦味儿”里成长

“冲厕所，听起来轻松，若真干起来也真不轻松。”身穿校服，白皮肤，1 米 78 大高个儿的李祥华，文质彬彬地坐在记者面前：“我之所以站出来，敢于承担这项工作，缘于父母从小就灌输给我的‘自强不息，靠双手吃饭’的观念。”

“……记得在农村上小学时，父亲也正在外求学，家里生活十分艰难，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个人。那时候，看电影才 5 分钱一张票。有一次演电影《大闹天宫》，年幼的我是那么不懂事，缠着妈妈要钱。妈妈找了半天，才从抽屉缝里抠出两枚硬币，一枚 1 分，一枚 2 分。我‘哇’地一下放声大哭，母亲也落泪了。直到现在妈妈还常给我念叨这个‘3 分钱’的往事。我感触最深的是，坚强的母亲从未向生活低过头。她常常想方设法抽空做几件衣服，拿去卖了，赚了几块钱来补贴家用。有一次四叔找到我妈说：‘二嫂，你看，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学了，我这学费还差 10 块钱。’妈妈想了一会儿，说：‘行，你别管了！’于是，她每天做衣服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去卖，半个月下来，她把 10 块钱送到了我四叔手上。妈妈每次提到这件事，脸上都会露出自豪的微笑。”

像这样苦味儿的事，都给李祥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现在，他仍不愿意伸手向父母要什么东西，在他看来，父母的一分一厘都是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非常珍贵，是他不能够随随便便糟蹋的。

后来，父亲李振国调到县里教师进修学校当教师，他家也搬到学校，家境才逐渐好转起来，他也到县里上了中学。在此期间，他常听到父亲和别的老师谈论外国的一些中学生擦车、擦皮鞋，利用假期挣学费的事。最让他惊奇的是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儿子刷盘子。对这些趣事，他感觉挺新鲜，接着是佩服，后来就觉得自己也该这样做，父母也常拿这样的例子教育他。父母常说：“父母不能管你一辈子！学点本领，将来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妈说得更有中国味：“到时候，不走也得拿棍子赶走你！”

祥华的父亲并不把考试看作是成长的唯一出路。在高考前，父亲轻松地讲：“别紧张，不用急，考上了更好，考不上咱就在路边摆个摊修自行车，一样过。将来我老了，退休了，就在你旁边摆个书摊，咱俩坐一块，没事说说话，我看还好哩！”父母希望他成才，然而更希望他立身，成为一个自力更生靠双手吃饭的人。

二、厕所有了“所长”

父母的行动在无形中熏陶着祥华。祥华非常懂事，不用家长催促就能刻苦读书，终于考上了这所名牌大学。父亲高兴万分，曾多次表示他有能力供祥华大学毕业，彻底解除祥华的后顾之忧。但祥华有志气，有骨气，看不惯一些青年（包括社会青年）依靠父母生活，靠父母节衣缩食供孩子在家闲着和念大学。他暗下决心，要改变这种依赖父母生活的旧习，凭本事闯天下。因而，入校后他很注意捕捉劳动机会，力争在大学期间能多减轻一点家庭负担，把自己锻炼成熟起来。大连的消费比家乡高多了，这更坚定了他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决心。他想，只要有活，咱就干。当他得知招聘水房和厕所清扫员时，激动不已。可是清扫水房还是清扫厕所之间，选啥干，一时没拿定主意。

夜深了，同学们都睡熟了，唯有祥华失眠了。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出现在他的眼前：“祥华，你既上大学，也就是大人了，是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要扎扎实实地培养自己。干什么事情不要挑肥拣瘦，要积极主动些，要有自主精神……”现在，水房的活肯定会轻些，有不少人抢着干；扫厕所又臭又脏，还兴许让人说三道四瞧不起，肯定没有愿干的。翻来覆去，无非就是一个旧思想观念在作怪。父母临送自己时已经说了，虽然家中经济不太宽裕，但是，紧紧裤腰带，还是供得起自己念大学的。但我决不做寄生虫，躺在父母的汇款单上享清福。大学生扫厕所又怎么了？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扫厕所决不是低下的活儿。想到这，祥华眼前一亮：我专挑最脏最累的扫厕所这一行干干，锻炼自己，也感谢学校给我创造这么好的实践机会……

认识提高，决心已下，只等报名。第二天，祥华就站了出来，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对大家的惊讶，祥华一点也不感到突然。

开始，学校是很担心的。祥华这么一主动，在场其他同学也鼓着劲儿想报名。招聘办老师脸上不由露出了笑容，立即鼓励，希望祥华能带个头，把大学生扫厕所这项工作搞好，在全校做出个样子来。

报完了名，说干就干。祥华走马上任当“所长”了。按学校规定，一个厕所由两个学生来清扫，因报名的少，祥华就一个人扫。9月16日，是他第一次扫厕所。早晨6点50分，祥华便到传达室拿水桶、拖布等工具，传达室的廖大爷异常高兴，立即拿着工具领祥华到厕所间，亲自教他如何冲便池，如何拖地，一一示范。那热情，那仔细，让祥华好高兴。他劝廖大爷回传达室后，自己试着做了几遍，算是熟悉熟悉吧！这天早晨，他一连冲、拖了好几遍，连蜘蛛网什么的也清扫了，还将玻璃擦得透亮。清扫完毕，足足用了40分钟。他只感浑身发热，身子直贴衣服，汗珠子从脸上掉下来了……

清扫完厕所，祥华清理了一下便跑进教室上课。等到下午3点30分下课，他又跑到传达室库房取清扫工具，开始第一天第二次清扫厕所。首先，他拿起水桶到水房打水，拎到厕所上下冲10余桶，接着从便池里到池外连续拖几遍。拖完再用水冲，这样反复才能冲净。

晚上睡觉前，祥华开始第三次清扫厕所……

有的学生将厕所当成垃圾桶，把剩下的饭菜及杂物都往厕所里倒。祥华看到，从来不抱怨，而是将其清扫成一堆，然后用簸箕将垃圾一又一地送到很远的楼外大垃圾箱中。为此，他写了条“请作文明人”的告示贴在厕所墙上。

最忙的要算“211工程”预审的那两天。那时，班级的军训还未结束，

只要一下操，祥华拿起拖把就往厕所里跑，唯恐自己有什么疏忽，给学校丢了脸。

三、自立是无价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能自立母不愁。

1995年底祥华经过刻苦读书，在成为河南省滑县高中的佼佼者之后，一举考入大学。家乡沸腾了，父母从千里之外特地送祥华来上学。当时父母就住在10舍，离他住的7舍很近。可父母走的那天早上，根本没来看他。等到10点他去看时，才知父母已在9点走了。祥华心里很不好受，后来他收到父亲来信，信中说：“我本来打算走时去看你，可你妈说，孩子既然来了，就让他安心学习吧，所以就没有……”看完信，祥华明白父母的苦心，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正是因为如此，他清扫厕所非常用心，使尽全身力气，使厕所焕然一新，不仅受到校领导的好评，而且也受到同学们的称道。

校化工学院副书记多次找祥华了解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再接再厉，劳逸结合。祥华说：“现在扫厕所多吃点苦，我不怕。”班上很多同学并没因他扫厕所而看不起他，而是在班级工作和生活方面都给予他很大支持。1995年底，祥华得了急性阑尾炎，同学们都主动跑前跑后帮助他，主动借给他钱，这些都是对他极大的安慰。

就这样，在紧张和兴奋之中，一晃就是一个月。凭自己的双手，祥华第一次领到劳动所得的工资，心情特别激动。他拿着滚烫滚烫的一沓人民币往邮局跑。

祥华打电话告诉父母：“爸爸、妈妈，今天，我终于拿到自己挣来的工资了。我好高兴！”

电话那端，妈妈激动得话音都变了，只是连连叫儿子的名字，最后，还是爸爸说：“好，坚持下去，但别耽误学习。”

放下电话，一出邮局的门，祥华落泪了。是的，160元钱并不多，是有价的，而校领导、父亲的鼓励和希望是无价的，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是男儿就应去闯荡 ——大学生远航队横渡渤海海峡

在苍茫的大海上，除了几只海鸥，一片寂寞，两叶惹人怜爱的小红帆在碧波中若隐若现，帆上雪白的“大连海事大学凌风1号”和“凌风2号”格外精神。突然，巨浪排空，两个小红点消失了。

对于大连海事大学“凌风”远航队的24位兄弟来说，1996年8月4日是个值得终生记忆的日子。这一天，他们就将靠帆和桨去驾长风破万里浪，实现“凌风”挑战大海，战胜大海的瑰丽理想！

一、你是在干一种事业

庄严的进行曲响了起来，送行的人群中过节似地热闹。队员此刻像赴约的恋人，无比的自信和骄傲。

授旗，宣誓，王教授对自己的弟子多少还有些放心不下：“在海上什么危险都可能碰到，一定要沉着冷静。”“是，教官！”师生一齐大笑起来。

人群中有一个女孩，深情的眼睛中带着忧伤：“只觉得你是在干一种事业……想哭不敢哭，不敢去寻找你的身影，怕控制不住……”

“扯帆启航！”队长阎明宇下令了。

二、生死早置之度外了

1. 四面楚歌

“1号1号，你桅灯熄灭！”

刚才还朗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1号，顿时变得十分紧张：渔船如织，夜航没有桅灯，后果不堪设想！几乎同时，值班队员发现，单边带与学校失去联系！怪事不断的出，马灯一点即被风扫灭！

艇内沉静得可怕，队员死死盯住来往渔船的红绿灯动向。吴焕功麻利地用手电开始检查桅灯。

“1号1号，用手电显示位置！”就这当儿，一渔船直奔两艇而来，眼看就要与1号相撞！阎明宇一声怒吼：“右满舵！”王伟一愣，下意识打左舵。说时迟，那时快，小阎一个箭步，再打右舵，队员惊叫起来了！2号艇强光手电猛地扫射到“大连海事大学凌风1号”！渔船如梦初醒……

这是8月4日夜航的一幕，大海给队员上了第一课。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横渡渤海海峡确实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以前训练都有机动艇护航保驾，高枕无忧，但真正的远航是没有安全保障的。队员们心事重重，前八届远航队在出航中曾折断过大桅，触过礁，搁过浅，是否会重蹈覆辙，谁也无法预料。

“喂，你睡着了吗？我说今天那条渔船差点做了咱们的上门女婿！”黑暗中姜永杰想幽默一下，缓和一下空气，但没有一个人笑出声来。想起刚才那一幕，阎明宇的心还在翻滚，真有些害怕。平时，都经过了上百次的训练，很可能就是自己导致了王伟的紧张、慌乱，太可怕了。他长长地吸了口气，一幅稳坐钓鱼台从容施令的图景在脑海中构筑起来……

2. 瞒天过海

远航第二天，遭遇了急流和渔网。一天酣战，手上血泡水泡连成一体。6日，海上天气出乎意料地好，帆扯满了风，艇走如飞，队员们受宠若惊。蓝

色的大海真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美，海风吹起，满溢着海浪芬芳的恬静，浪花柔情脉脉地轻抚着小艇，难怪这些男儿痴迷着海。陈修峰开始吊嗓子，“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冷秀斌找路过的渔船央求到了鱼钩，乐不可支忙着垂钓。“喂，你们说，咱们昨天碰到的渔网像不像足球大门！”姜永杰大声嚷嚷。兄弟们齐声附和：“可咱们就是比不上大连万达，一次球也没进！”还挺自豪。“进了可就怪啦！”“闭嘴！足球网不行！”“我们请队长评理……”毫无顾忌的笑声在水上漂着。

宫成鑫此刻躺着，他一紧张就不会晕，风平浪静的时候反倒晕得特别厉害。他想起了给女朋友的信，心中涌起一丝苦涩。“我去冒险了，每个男人都会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是航海……去年实习时，在大海上，我真有一种突然找到自己人生价值的感觉……如果你了解海，了解航海这个职业，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不知女朋友读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人们对海了解得太少了，一般人所认识的海也就是海滨浴场的浪漫。这个学生会主席心里沉甸甸的。

吴焕功此时又对通讯设备进行了一次全面检修。他天生是航海的料，总是乐呵呵，天生不晕船，船上那些令人头痛的琐细事都归他管，被教练誉为“最后一张王牌”。

吴焕功有一个习惯，每当十五月明时，他总要到海边走走，想远方的女友，也算是与海交朋友。海边的视野特别开阔，在海边一站，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远航队这次集训，用上了上课以外的几乎所有时间，风吹日晒雨淋，皮都曝了几层。在小艇中感受晕船的滋味，每一次都吐得五脏欲裂。队员们下意识地不想干了，但一走艇，男人的豪情又油然而生。

这天傍晚，收到天气预报，当晚有大到暴雨，8~9级阵风。两艇决定在大竹山岛过夜，这时意外地发现不远处大连船学院的“海鸥”远航队护航舰812军舰锚泊了。

天突然黑作一团，鸟叫声说不出地凄惨。船系在两条挨在一起的渔船外边，黑暗中，有人惊呼，“渔船走锚了！”队员们心惊胆颤。

白天已荡了好几小时的桨，队员疲惫不堪，防雨罩下站的位置都不够，阎明宇焦急万分，一位好心的渔民要送队长上812军舰联系，让队员避雨。当舰艇学院副院长得知远航队只有24名大三的学生，系学生自发组织，没有护航和其它保障，马上问小阎有什么要求。这时舰艇学院远航队的6艘艇已全部泊进港湾，队员也已在岛上的驻军基地休整了。小阎请求派机动艇前去迎接队员，但风浪太大，机动艇根本无法放下。小阎心忧如焚。一出甲板，风呜呜而过，几口气没上来。

“哆嗦嗦，哆嗦嗦，不要冻死我，明天就垒窝……”姜永杰在做寒号鸟状。此时艇摇晃得要把人好端端扔到海里去，有的队员已晕得不行了，趴在艇上呕吐。大个子危振军足足淘了大半夜水，淘着淘着睡着了。有4个人疏散到渔船的驾驶台篷下，正迷糊，一声痛呼：“虫子进耳朵了！”大家眼皮重得抬不起来，只当是小飞虫。三个人不知谁含糊一句：“没事儿，挺住！”“哎哟哟，真疼死我了……”那个队员捂着耳朵蜷成一团了。这一叫可真把人吓坏了。大家迅速回艇内找油，油未找到，匆忙拿油精，一滴下去，虫子狠劲钻，队员疼得直打哆嗦，猛灌进一杯，虫子才死了。谁也不敢睡了，提

心吊胆地捱到了天亮。

不知何时天亮了，已是风雨过后。瞒天过海，现在离烟台港已近在咫尺了。一只服装整齐的远航队卸了装，花红柳绿很是狼狈。几乎一夜间，队员们饱满的双颊凹陷进去了。

812 军艇上随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感慨不已：“你们的领导有胆魄！你们学生了不起！”

3. 风雨同舟

7日，再一次遭到浓雾的包围。突围后已是晚7点多了，终于到达烟台港。其时所有的队员都已饥肠辘辘了。中午每人才分了一袋方便面和几片榨菜，快饿趴下了。在烟台救捞局休整了两天，搞了一些活动，10日返航。他们没有想到，更大的挑战就在前面。

返航远离岛屿，航程特别顺利，到晚上9点，一帆风顺，估计再过三、四小时就可以到离大连港不远的帽岛了。

谁也未曾料到，这时海面开始出现戏剧性变化：风速骤减。10点，开始下雨。凌晨3点大雨倾盆，风向乱变，西南流加大，艇急速后退！凌晨6点，海况达到本次出航的困难极限：逆风速6级以上，浪高2米多。两艇如浮萍漂在水面上。

阎明宇猛地推醒旁边的吴焕功：“老吴，你来操舵！”此时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一会儿，他想出一个很笨的方法，艇往这边倾，人往那边倒。但艇摇晃得越来越快，人折腾得都忙不过来。

茫茫大海等着救援，太晚了！

这是一次心理、身体及意志力的巨大挑战！

“既然参加凌风远航，生死早置之度外了！”吴焕功这句话再一次点燃了兄弟们战风斗浪的豪情！

只有孤注一掷了，阎明宇当机立断：落帆，荡桨顶浪！什么都来不及想，只能拼尽全力与大海作最残酷的较量！始料未及！

落帆时，一个浪猛扑上来，正解帆绳的王庸凯一个趔趄，几欲随浪而去！人定胜天，凌风必胜，凌风必胜！

邵勇慧用自己的雨衣盖着罗经，一边荡桨一边看罗经，艇摇得太厉害了，坐都坐不稳。浪猖狂地把艇抛来掷去，怒涛劈哩啪啦，当从波峰跌至浪谷时，桨打不到水了！荡桨在做无用功！

领桨的队员已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两个人荡一把桨，实在荡不动了，陈月海就趴在桨上，用体重推桨前进，回桨时，桨一落空，一下子来了个后滚翻，几欲休克！已经吐尽胆汁的宫成鑫软绵绵曲蜷在后舱，他已好几顿没吃一点东西了，一口气啃了三袋方便面，不由分说夺过了领桨员的桨！容不得喘息！也许只要谁少划那么一桨，大海就会毫不留情地让勇士们葬身海底！淘水的已只能趴在那儿才能够弯下腰去，两个人才勉强拎得起小半桶水。

沧海月明珠有泪！

急啊，我们的远航队！

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是鼓励，都是迸发出生命的激情，都是无往不胜的勇气。负剑的荆轲啊，心中的悲壮已将全部自豪淹没！

“凌风凌风，我是海大，穿上救生衣！”单边带里学校发命令了！

谁也没动，没有时间，没有谁想到弃船跳海。不到最后一刻，不会选择这条路！

风雨同舟！

“队长，舵控制不了。”老吴已汗如雨下，“顶住！”阎明宇撞开他，接过舵。

一排排巨浪铺天盖地，队员们呕几口再荡几下，千百次重复。号子声响在大海的上空，嗓子哑了的队员一齐吼起来了：“兄弟们挺住！”阎明宇声音哽咽。完全湿透的衣服，全身寒战，眼睛已被雨水汗水模糊。出航前还在打吊瓶的冷秀斌嘴唇发紫，面色吓人，神志出现模糊。

掀天的浪中一片茫茫，滔天巨浪分开两艇，“死也要死在一块！两艇决不能分开！”2号用望远镜望见了1号，艰难地往回荡！

“兄弟们，还记得我们的宣誓吗？我们将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不畏艰险，奋勇向前，迎接大海的挑战和考验！”未来的中国船长，挺住。

下午1点，大海让步了。也许谁都无法相信，从晚上10点到现在，队员们整整坚持了12个小时！手、脚都白了一层！

三、真正的男子汉

很多队员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港的。当两位教练开着机艇找到他们时，两条艇上清醒的人已所剩无几，几乎全趴下了。教练噙着眼泪下令拖回去，清醒的队员还是坚持休息会儿自己回去。

9月12日，24位凌风兄弟围坐在3舍428“凌风总部”，畅谈体会。

——挑战自己，为心中的目标而奋斗。真正的荡气回肠的远航只有几天，开始是抱着好玩的想法，但通向这条路的角逐、训练、准备等是漫长而艰巨的，兄弟们都是在一种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挺过来的。以前什么活动都觉得没意思，其实主要是没有目标，大学可真白过了，这次远航使我再无法容忍随波逐流的生活。

——只要敢拼闯敢吃苦，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次远航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

——不经过航海，不知道真正的苦。这次远航，与海打交道，吃了大苦，经历了大风大浪，我对航海这个职业的认识更深了。对我的灵魂也是一次深深的震颤，以前的斤斤计较突然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是男儿，就该去闯荡一番，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大气魄的真正男人。

——自始至终我感动于我们兄弟间的那种患难情谊，完全地融为一体。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24个人的力量却是巨大的、惊心动魄的。

危振军给大家讲了一件事。到达烟台港后，他和陈月海在海边照看艇时，一艘客船上的负责人问他们：“学校奖给你们多少钱？”他们当时一愣，心里像被什么狠狠地蛰了一下：“冒险还要钱？为了这件事，很多领导的门槛都要被我们踏平了，很多生病的队员偷偷地自己带针药上船……只是要见见真正的风浪，锻炼锻炼……”那个人很不理解，丢下一句：“你们太傻了！”咱们兄弟不是这样的傻子吗？

一阵喝彩在凌风总部响起……这段日子将是大学生生活里最值得怀念的东西。

也许1年后，当他们自豪地踏上中国海轮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男儿的气魄走向世界时，他们还会想起“凌风”，想起难休难眠的6天6夜中24位兄弟的同舟共济，想起青春无悔的冲浪激情，直面危险的无所畏惧！感谢大海，是你亲手塑造了“凌风”，是你铺平了他们通向中国航海事业的道路。

情暖童心 ——一个大学生救助患病女孩

陈红桥，是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人文社科系 95 级学生。1995 年寒假，陈红桥带着读大学的喜悦之情回到家乡十堰。为了挣点生活费，减轻家庭的负担，回家第二天，陈红桥便到大街上摆起地摊卖甘蔗。他发现，离他的甘蔗摊不远，总有两个瘦弱的小女孩在捡垃圾。经打听，大一点的叫李锐、13 岁；小一点的叫李明，她们是姐妹俩。她们一家是几年前从乡下来的，父母靠修鞋来养家糊口，李锐、李明长这么大也没上过一天学。陈红桥还了解到，李明更为可怜，她患有癫痫病，常昏倒，全身痉挛，口吐白沫。

对于李明的病情，陈红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今年春节后，陈红桥用他那颗真诚的心说服了李明的父母，同意他带着李明来到江城武汉就医治病。到校的第二天，他就带着李明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作了心电图、脑电图，还做了 CT 扫描，花了 580 元钱，再加上治疗，几天下来，陈红桥卖甘蔗挣来的钱和父母给的生活费共 1000 多元都用完了。

在给李明治病的同时，陈红桥还到处写信求医。终于，在同济医科大学一位教授的推荐下，陈红桥得知南京浦口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癫痫病较为有效。

他当即致函南京，为了保证信能安全寄到，陈红桥将信复印了 3 份，用了 3 个信封同时寄往南京。不久，南京方面就有了回音，要他迅速带病人到南京治疗。

高兴之余的陈红桥又犯难了，李明在武汉治病已用去他 1000 多元，现在手里只剩下借来的 300 多元钱。怎么办呢？陈红桥的老师 and 同学们都为他的义举深深感动，大家便纷纷解囊，短短 5 天时间，陈红桥就收到了捐款 2500 多元。师生们的捐赠，又给了陈红桥极大的鼓舞。

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陈红桥从十堰把李明的父亲接了过来。4 月 30 日，陈红桥和同学许恒东带着李明及其父，登上了开往南京的轮船。

到了南京之后，主治医生郑维峰放弃了休假，在星期天为李明作专门诊断治疗，医院也减收了部分医药费。陈红桥在南京邮电学院的同学沈劫、彭志刚，也给予了他们资助。在大家关心和医生的悉心治疗下，李明的病开始好转。

5 月 7 日，陈红桥一行从南京回到武汉。下轮船时，一位女士得知陈红桥救助小女孩的义举，非常激动，立即将身上 80 元钱交给了陈红桥，并要前来接自己的司机先把陈红桥等人送到学校。

李明的病情虽有好转，但要治愈却还得 4 至 7 个疗程。每个疗程为 45 天，约需 1000 元药费。这笔开支使陈红桥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了，他决心呼吁社会救助。为了不影響自己的学业，陈红桥只好暂时让李明的父亲把孩子带回十堰去。临行前，他再三叮嘱李明的父亲，一定要按时给她吃药。他还根据医生的要求，给李明开了一个菜单，要她家里不要给李明吃不合适的食物。李明的父亲，这位老实的中年农民，临行前紧握着陈红桥的手，热泪盈眶，说不出话……

陈红桥的呼吁立即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响应。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都踊跃地加入了“长助组”（长期帮助李明的小组）。

陈红桥在十堰的同学也表示尽力帮助李明姐妹补课，让她们用 3 年的时

间学完小学全部课程。

目前，“长助组”已筹集到 1000 多元，为李明治病、为姐妹俩今年秋季上学准备了第一笔钱。

一个大学学生的“西游记”

他叫刘劲松，湖北大学历史系 92 级学生。从 1993 年初至今，他怀着对西部问题的极大兴趣，利用寒假时间，自费 4000 多元，深入走访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南海、宁夏、内蒙古等 17 个省、自治区的广大农村，进行综合考察，探求中国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原因。

一、走进贫困

1993 年 3 月 28 日，他在武昌火车站搭上了开往湖北蒲圻市的 528 次旅客慢车，开始了他的西部之行。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次去农村调查，该怎么与农民打交道，提些什么问题，土地、税收、治安、还是……”车到蒲圻，天下起了小雨。第二天，路很滑，他好不容易翻过几座山头，在一片竹林中，他敲开了一间破旧的农舍，以下的情形是他的日记所述：

“老者将我引进家，随后，叫来左邻右舍。我没想到这些农民竟将我当作了上头来的大人物般的对待，纷纷诉说村里的情况。现在细想，大抵归纳如下：村干部运用职权，损公肥私；农村税收的各项摊派太多。一农户称，每年税收有 50 多项，连名字都说不清；学校收费太高，承担不起孩子学费；村内青年既不愿干农活，又不愿出门务工，终日游手好闲，治安很坏。临走，乡亲们把我送出村子，并一再嘱托一定要将他们的呼声反映到上面去。望着这一双双纯朴善良人们的眼睛，我真不知说什么是好。农村，我们的农村，原来存在着这么多期待解决的问题，却最容易被人忽视了。当我们沉迷于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时，有谁会想起，我们的农民，也需要人们的理解，也需要人们的关怀。”

每到一地，他都先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找到该地县志和近两年人大、政府、政协等部门的有关文件，了解基本情况，然后通过分析抓住重点问题下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1993 年 8 月，在他父亲的家乡——四川省蓬安县调查时，他发现一个近千人的村子，竟无一小卖店，要买点日常生活用品的话，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去镇上才行；还见过一个村小学：一间房子，里面挂着一块小黑板，没有凳，课桌也没有。贫困，使许多孩子失去了 9 年义务教育的权利。他发现该地个体经济大滑坡，原因是税费太多，个体户不堪重负，纷纷关门到沿海打工；发现白条、绿条现象严重，为此他走访了县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徐家镇调查时，他对镇政府的浮夸风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怒气，甚至直接质问镇长，还找到县政府要求回答，令别人十分尴尬。

越往深处去，他对贫困就有了越多的认识。在黄土高原的甘肃中部地区，他看到：树木和植被本来就很少，水土流失严重，但当地居民仍在不断地破坏植被，以致树木被砍光了，就连山坡上的草皮地被铲下来做了做饭取暖的燃料。甘肃定西县，是全国最穷的贫困县。他沿途所见村村都是土坯房，许多农户除了桌、床、锅、碗等以外别无他物。满山光秃秃，寸草不生，那里的人民为了生存，只好找一些尚能种植谷物的山坡，甚至岩头窝角，种一窝算一窝。雨水本来就少，人畜饮水已成困难，谷物更是靠天收了。然而当地居民仍抱着“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稳”，“没粮吃，政府会救济”的思想。“可悲呀！”他为此深深慨叹。

在考察中，他还发现封建迷信思想仍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存在着。不仅重大的生产活动要祭祀神灵，就连出门远行，修房筑路，婚丧嫁娶都要算命

看日子，图个吉利。身体一旦有病，更是祈求神灵的庇护。在四川蓬溪县，农民为了求雨，一夜之间就筑成了一座小庙，并塑了菩萨，烧香磕头，乞求上天……

在甘肃青海交界之地，他看到的一个情景至今令他想哭，三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在岗子上对过往的火车丢石子。火车渐渐远去了，他却仍然久久地凝视着火车远去的方向……

他在思考：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遭遇与艰辛

他虽然胆子很大，又能吃苦，自信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但也碰到了一件使他心悸不已的事。1993年8月，疲惫的他在四川仪陇县的一个乡招待所找到了一个两人间，倒下睡着了。凌晨四时，他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证件！”两位公安人员站在面前，拿着电警棍和手铐。他慌忙找出学生证。他们放过他后，拨开对面的帐子，喊着：“就是他！”不由分说，一把铐住那人，原来那人是抢劫储蓄所的歹徒之一。接着便从那人床下搜出一把二尺多长明晃晃的刀子和一叠50元大钞。他当时吓懵了，不知所措，竟没有想到要换房。后来他回忆说：“那夜不是一场恶梦，一切都是事实。”

在贫困的西部农村考察，更有令他难以想像的艰苦。1993年8月，他到四川蓬安县徐家镇石油坟村搞调查，在一个名叫刘友孝的农民家住了两个星期。刚去两天，便水土不服，浑身长满红斑，奇痒无比，偏又不敢抠，因为如果抠烂了，那里就没有药治，好多个不眠之夜就在这抠与不抠的矛盾斗争中度过。加上那儿有一种极小的，肉眼很难看见的蚊子，叫蔑蚊，也“趁火打劫”。一次他到桔园采访回来，发现胳膊和脸上竟被咬了60多个包。为了防咬，大热天他不得不穿上长衣长裤，还带上一把扇子。上厕所也是一大难题，农村并无正式的厕所，往往跟猪圈合在一起。上厕所时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子，尽量减少猪粪的恶臭侵袭；其次，也不得不防备猪跟你开玩笑（从猪栏里伸出头来拱你）。有时，他实在不能忍受猪的骚扰，只好步行10里多到镇上去“方便”。

在那里，一日三餐尝不到酱油、醋的滋味，更别说胡椒粉、味精了，小菜也仅有辣椒和茄子。所谓的“补品”则是黑面条上漂几根豆角。夜晚，睡在潮湿的屋子里，房内的大尿桶散发着骚味，熏得人难以入眠。有时半夜醒来，突然觉得有东西在身上乱爬，一摸才知道是从充当床垫的稻草里爬出来的小虫在作怪。

那儿没有公路，尽是田间小路，当时正值雨期，道路相当泥泞，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小窝子，拔半天才能拔出来。后来，他索性就不穿鞋子，打着赤脚满地跑，有时踩上牛粪，只能自认晦气。

1994年除夕夜，他却在湖北宜昌客运港的寒风中啃着面包。晚10时，缩在候船大厅一角，犹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想到本应在家坐在火炉边与家人团聚，舒心地看春节联欢晚会时，他不禁鼻子发酸，但他并不认为是自讨苦吃，因为他心中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三、“打工潮”的触动

考察途中，汹涌的“打工潮”一次次给他以心灵的触动和震撼。

1993年4月，在去四川渠县的汽车上，他跟两个打工仔侃了起来。他们

向他诉说了打工的艰辛：时间被老板限制，每天至少工作 14 个小时，一般打工仔年收入 2000 ~ 3000 元，但那是血汗钱。有一技之长的还好一点，能当包工头，最糟糕的是身体不行，又没文化，只能卖苦力。对于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养家糊口而已，而且因打工落残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越往西走，这种人越多。

乘长途汽车进入河南光山地区，他发现每块田地都有坟墓，显然，这些逝者都曾是田地的主人，“叶落归根”的传统还那么执着。然而等他赶到信阳火车站时，却惊呆了。无数的打工仔早已淡漠了家乡的观念，在这里等待南上北下的火车。

1993 年 7 月，他在湖南衡阳火车站等车。这里，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妇人正抓住一个青年男子的衣服喊着：“不能走啊！”一打听，原来是母子俩，他们家住在汀南，儿子不甘贫困，逃出家门，准备南下打工。母亲放心不下，追到县城，又追到衡阳火车站，想把儿子留住。儿子仰头长望阴霾的天空，泪水夺眶而出，但他毅然褪下衬衣，光着上身直奔火车。母亲被这猝不及防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茫然望着儿子奔跑的身影，痛苦地跪在了地上，尖声叫道：“儿啊！我的儿！”回答她的是列车启动轰鸣声。“轰隆隆”、“轰隆隆”两声惊雷响过，暴雨随之倾泻下来，可那位母亲依然跪在那里，手中紧攥着一件白色的衬衣……

1994 年 7 月，在四川营山县火车站，一群打工仔上火车，火车启动了，突然听到车外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爸爸啊！”那是年轻母亲手臂上小孩的哭声。刘劲松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心不禁震颤起来，眼圈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这些情景给他在感情上的刺激太深了，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起初，他觉得打工仔离妻别母，飘泊异地太可怜，太令人同情了。但他静下来一想：如果他们不出去，死守着那片土地，满脑子旧思想，旧观念，只会永远贫困；而“打工潮”的出现，正好表明了新一代的农民正在走出地域的封闭圈，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通过进一步了解，他发现走出去的农民，观念上甚至比他们大学生还要新潮。在广西到贵州的火车上，他碰到两个打工仔，男的是四川的，女的贵州人，他们都在深圳打工，异地相爱。今天小伙子是到姑娘家“倒插门”。谈到他们自由恋爱的经历时，刘劲松觉得他们跟大学生恋爱完全是一个模式。并且，他感受到打工仔观念上很少“官本位”，而代之以一种强烈的“金本位”。打工仔在一起谈的总是谁赚钱多，谁的老板富。不管相互认识不认识，相似的经历使他们感情上趋向同一，走到一起能相互理解和帮助。

对于打工潮给城市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刘劲松认为这是城市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国家有条件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出现的东部地区的资金、人才向西部渗透转移的方向，可以看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

四、沉重的药方

仅仅体验贫困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找出西部贫困的真正原因。在《论中国西部地区贫困的真正原因》一文中，他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认为：“社会系统的长期封闭，不单造成了物质生活方面的贫困，更为严重的是割断了社会之间的正常交往，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或泯灭了社会成员的求知欲和创新欲，造成思想的僵化、保守、愚昧无知，

是造成西部地区贫困的真正根源。”据统计,20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的比重,云南为34%,贵州为49.1%,四川为28%,宁夏为29%,而有一个地区竟达到90%。在某地考察时,他发现一乡镇初中的英语教师,竟只能教A、B、C,其余的课得靠学生“自学”。所以,他指出:“思想、文化的贫困比物质生活方面的贫困更可怖,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要脱贫,必须首先治愚,在思想文化上脱贫。”于是他总结出,物质上的“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部贫困问题,“造血”比“输血”更为重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是西部地区脱贫致富的长远战略。

1994年暑假,他查阅了有关贫困地区的上百篇文章及有关专著,结合贫困地区的不同情况及亲身体验,通过理性分析将西部贫困地区分成黄土高原贫困类型,西南喀斯特山区贫困类型,东部丘陵山区贫困类型,青藏高原贫困类型,蒙新干旱贫困类型等5类,并对每种贫困类型的主要优点及优势,主要问题与贫困原因,开发方向及途径进行了具体分析。

他写了《当前西部农村社会各阶层分化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写了《蓬安县农村调查》,剖析了当前该县个体经济滑坡,农民负担过重及白条、绿条现象严重的原因;写了《大别山贫困落后的原因及脱贫致富的关键措施》,提出“智力,科技扶贫是实现持久的扩大再生产的无尽源泉,是扶贫致富的根本手段”。他还详细探讨了迅速提高贫困山区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途径,着重指出“对农民进行影像教学是一种便捷渠道”;考察中,他走访了20多个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在《论中国西部地区贫困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战途径选择》等论文中,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了扶贫的相应对策。

他还写了长达32页共计16000多字的《关于湖南省城镇体系的历史回顾、现状分析及远景预测》,这是他查阅了16部专著之后写下的文章,以探讨城镇体系的发展和对农村的辐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考察论文、日记以及各种书面记录达10万多字。从中可以看出,他实在是一个热心的郎中,总在十分积极,十分投入地给西部的病症开良方。这些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沉重药方,不正是他对西部地区人民拳拳爱心的写照吗?成果丰硕的西部考察以及在这一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吃苦耐劳,求真务实的精神,使刘松劲赢得了学校和社会的广泛肯定和赞誉。还在四川蓬安县考察时,县政府、妇联等部门就接他去作客,并邀请他毕业后到当地的天歌集团工作。1994年秋他返校后被评为“湖北大学社会实践积极分子”,《长江日报》、《湖北农民报》等新闻媒介纷纷派记者采访他。但他自认为“没什么”,开始不肯接受采访,后来实在经不起记者们的轮番“轰炸”,只好同意了。今年3月15日,他的事迹经《湖北农民报》报道后才逐渐地传开了。

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说:“认识西部、研究西部,不仅要深入西部,还要走出西部看西部,为了西部而到东部看一下,再通过对东部的了解加深对西部的认识。在对比中找原因。”为此,他准备1995年到沿海走一圈,去寻找心中的答案。

地平线上,又将出现他匆匆的身影……

大学生当上了“村主任”

梁振，是河南大学生物工程系94级学生。在河南开封县八里弯小河村，农民们都亲切地喊他“梁主任”。

1995年7月8日，梁振参加大学生社会实践来到小河村挂职村委会副主任，当上一个最基层的“官”。初次当“官”的梁振吃住在农家，短短几天，在田间、地头、农民家中访谈。1000多人口的小河村，没有什么乡镇企业，只靠农业收入。纯朴的乡情和贫穷的小村，激起梁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感。他发现这里很适合食用菌栽培，就劝村民种植食用菌，没有人理会他。但梁振没有灰心，食用菌栽培投资小，风险小，周期短，效益较大，对小河村来说是一项比较理想的投资项目。梁振认准了这个理儿，就去找村委会主任强信继续商讨此事：

“强主任，咱村棉籽壳和玉米芯很丰富，把这些东西作为培养基，经过消毒，就可以栽培食用菌，也许是一条较快的致富门路。”

强主任高兴地说：“那当然好，只是菌种那里来？技术谁给指导把关？”

“有我呢，你忘了我是学生物工程的，在学校练过几招，万一搞不懂，我可以请我的老师来。”

强信还是有点不信这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会鼓捣出食用菌来。梁振觉察到强主任的担心，说：“这样吧，不行，我们先试种，种植蘑菇比较容易些。”

“那就先试试种蘑菇吧。”

于是，梁振开始一家一家登门拜访，他把村干部和村民带到河南大学食用菌研究所参观。请研究所的老师讲解栽培技术。村民们开了眼界：咋个没用的东西，加点技术就能卖成钱？研究所的燕教授对梁振和村干部说：“技术和菌种我们所包下来！”

村委主任强信听到这句话，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当即表示：“凡是试种食用菌的农户，菌种和塑料袋所需费用，村委会拿。”一下子试种的人家达到40多户。

梁振一户接一户地散发技术资料，怎样洒水，怎样保持温度和湿度，怎样保持合理的光照度等等。暑期很快结束，梁振该返校了，村民们都一再挽留。梁振告诉村民，以后每星期六、星期天他还要来小河村。挂职虽然结束了，可村民们还是一口一个“梁主任”地叫着，显得格外亲热。

2个多月过去了，村民们试种的蘑菇已经长大，水灵灵的像云朵一般。村民路福成，在10多平方米的房子种下的蘑菇已经卖了300元钱，全部收回投资。按接种一次可以出4茬计算，他可以净赚千元，如果再扩大种植规模，效益将更加可观。

村民乐了，梁振乐了。

村主任强信的疑虑全消，为了更好地依靠梁振和河南大学这棵科技大树，在不通电话的情况下，村民们集资为村里买了一部“大哥大”，有什么事只要打电话，梁振和食用菌所的老师随叫随到。梁振高兴地说：“如果将来条件许可，还可以教他们种植黑木耳、灵芝、猴头等，那样收益会更大。当这样的‘官’，能为村民做点实事心里真舒坦。”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

——无双臂女大学生成洁

一、从双手到双脚

整整 10 年了，成洁永远也不会忘记。10 年前，也就是她正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她跟随父亲去看了场电影《典子》，这是一部真实反映日本一位无双臂残废女孩——典子的感人事迹的纪实片。回到家里，天真的她学着典子的样子，用脚夹笔写字，还说：“真好玩。”孰料 10 天后，命运却同她开了一个极残酷的玩笑，那天下午，她同伙伴们一起到田头去玩耍，却被因雨水淋湿而导电的变压器放电击中。这一击，竟使这位出生在山青水秀的四川南江县的少女成了“典子第二”。

望着昏迷不醒，手指被烧得弯曲焦黑，十个指头畸形，指甲脱落而生命奄奄一息的爱女，父亲发疯似地背着她翻山越岭，于天黑前赶到通县城去的山路上，脱下衣服拼命挥舞，终于拦住一辆过路汽车，把成洁送往县医院。望着这个被电严重烧伤的女孩，县医院医生均表示爱莫能助。于是，她又被立即转送到成都。父亲跑遍了省城各大医院，最终答复却都一样：必须截肢，否则会危及生命！为了挽救爱女的生命，父亲不得不强忍着眼泪，痛苦地在手术证明上签了字。从此，成洁便失去了双手。由于经济问题，成洁手术后伤口没有痊愈便出院了。在密密人群中穿梭，她的伤口经常被撞得撕肝裂胆般疼痛。望着女儿那强忍疼痛而憋得满头大汗的小脸，父母的心碎了。父亲用纸写上“此处有伤痛”字样贴在她的两个空袖管上，就在这两张纸条的保护下，成洁的伤口慢慢愈合了。

失去双臂的小成洁曾天真的想：没有双手，母亲会给她梳头、喂饭、洗脸，幼小的她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失去双手对她今后的成长意味着什么。她依然故我，依然那样天真和单纯，直至在生活中陆陆续续地遇到许多麻烦后，她才意识到了无手的困难。有一次，她躺在病床上，父母都出去了，口渴的她想喝水，却无法去“拿”放在床边的水杯。她用嘴去咬，一下没咬住，杯子摔破了，人也翻下了床。还有一次，父亲出去了，在农村的妈妈来了信，她很想看却怎么也撕不开。

父母不在时，寂寞了，想写字，无手拿笔。想看书，用脚夹过一本书，翻书时，不是翻不开就是一下子翻过了几页，半天也翻不到想翻的那一页。烦了，她哭着一脚把书踢开。过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又“拿”了过来……

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道灵光直贯脑际，典子的形象出现在她眼前。对，用脚练字，像典子一样。于是，成洁开始了用脚写字、料理生活的生涯。用双脚代替双手，要学会用脚梳头、洗脸、刷牙、写字甚至穿针引线，这是成洁最初的理想。

经过长期勤奋刻苦的训练，现在的成洁不仅会用脚写字、梳头、洗脸，甚至还能用脚弄饭、打电脑。

从双手到双脚，她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二、从小学到大学

失去双臂的成洁，在病床上躺久了，很想念书，她开始作为旁听生插班念书。小学升初中毕业考试时，监考老师考虑其用脚答卷，决定延长其答卷

时间，好强的她却怎么也不肯，她说：“健全的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最终，她以全班第二的成绩被录取到县重点中学。这一下，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她的名字，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紧接着，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新闻界对其事迹作了采访。一时间，成洁成了名人。

中学3年，在老师与同学们的热情关怀下，成洁的成绩一直排在全班前几名。“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学成后报效祖国。”成洁暗下决心。考上大学，是成洁当时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也是她的理想。

谁知命运多舛，就在1994年她高考前夕，有一天，成洁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偶然见到一张招生简章，上面规定了这么一条：凡是双上肢或双下肢不能自由活动的人，不能上大学。她的心凉了半截，这对于她那颗极想跨入大学这一神圣殿堂去深造的心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她惶惑了。

高考结束后，成洁的担心终成事实。她学的文科，其分数已达到录取线，但没有一所高等院校愿意录取她。征服过病魔的她，扬起了生命风帆的她，沉默了。

其实，早在高考前，她能否被录取就已成为当时舆论的热点。四川的《蜀报》，南京的《周末》，南昌的《经济晚报》……相继转载这一讨论，成洁能否上大学的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终于，命运再一次垂青于她，1994年8月5日，江西省高级职业学校校长看了评论后，当即说：“破格录取成洁，让她梦想成真。”8月11日，成洁收到了一封“特快专递”。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录取通知书也相继飘到她的桌上。最终，她选择了江西职高。

1994年9月4日，成洁踏上江西这块红土地，免费就读该校大专部商贸英语专业。为让其顺利完成学业，学校破例为她配了单人房间，并出资让其母亲留在学校照顾她的生活。

在职高，她的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并顺利通过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8门功课。目前，已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聋哑硕士研究生唐英的南昌大学作出承诺：只要她获得大专文凭，就破格录取她为硕士研究生。于校长还为她制定了10年发展规划，说：“成洁毕业后，如果具备出国深造的条件，学校还愿意资助她出国留学。”

1995年4月，江西省团委向全省青年发出“向当代青年大学生楷模成洁学习”的号召，于是，一股向成洁学习的风气在江西这块红色的热土上迅速蔓延。成洁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若见到成洁，人们从其青春朝气和活力之中，读到的更多的是自信与自强。

三、从现在到未来

成洁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然而，谈到未来，她却似乎出奇地平静，她说：“我对未来想得很少，我总觉得梦想和现实还是有相当的差距，想多了，反而有失落感。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好好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我不想成为社会的包袱。为做到这一点，以后的道路再坎坷，我都能走下去。”

成洁，深深祝福你……

千里我独行 ——记哈大线徒步考察第一人

他叫刘兴伟，去年7月2日，他从黄海之滨的大连出发，经过2136里的跋涉，纵贯东三省25个县市，来到了松花江畔的哈尔滨。8月23日下午3点10分，站在冰城著名的防洪纪念塔下，刘兴伟不禁热泪盈眶；2000里征程，53个昼夜的奔波，终于圆了萦绕多年的梦想。此时此刻，那些铭于心刻于骨的情节，又一幕幕浮现在心头……

一、准备

从1992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时起，刘兴伟就开始酝酿考察哈大线法制状况的想法。骑车？93年本校的“华邦之路：北京——深圳万里普法行”活动已将这种方式达到巅峰，刘兴伟不愿再蹈前人辙印。他想到了徒步行走，一方面，这种方式可随时看，随时听，随时记；另一方面，对曾经患过腰椎间盘突出有时课都上不了的他来说，这更是一次对生存能力和意志品质的挑战。为此，大二下学期，他坚持每天下午从学校到十三陵水库的万米长跑，以保证足够的体力。困扰他的难题只有一个——没钱。

94年寒假，他在家乡辽宁铁岭四方奔走寻求赞助，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后，他叩开了一家啤酒厂的门。厂长金连武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当场拍板拿出200元赞助，条件是沿途散发5500份宣传资料。

万事俱备，自94年6月27日，刘兴伟乘火车从家乡来到滨城大连。7月2日，他从星海公园迈出了千里征程的第一步。

二、行程

沿着哈大公路，刘兴伟平均每天行进70华里，最多一天从辽宁昌图到吉林四平，走了106华里。那次，他两只脚居然打了13个血泡。忍着锥心的疼痛，他用针挑破血泡后，第二天仍然一瘸一拐地行进，为了早点适应长途跋涉，他干脆是哪起泡哪着地，直到把两只脚走得失去痛觉。有一次前脚掌、后脚跟全磨烂了，他只好爬上铁路，用脚心踩着枕木，颠着小碎步支撑到目的地。

夏季最难抵挡的是酷热，7月17日——23日这一周，东北地区出现反常的高温天气，沈阳的出租司机甚至不敢出来拉客，刘兴伟却咬牙坚持着。7月22日，沈阳——新城小区，他创下一天喝3壶开水，8瓶汽水，吃10块雪糕的记录。虽然如此，他仍然完成当日行进82里的计划。伏天多雨，薄薄的雨衣耐不住风掀雨浇，他常常被淋成落汤鸡，最惨的一次，从吉林漂惠走到黑龙江双城，90里路，他被整整浇了一天的雨。

53天里，刘兴伟住过政府招待所、值班室、守卫室，也住过公所、农舍、营房和工地，甚至仓库。那是7月7日，刘兴伟来到辽宁瓦房店的许屯，他找到镇长，镇长不管他的食宿，值班老大爷也死活不肯让他在值班室里住一夜。天渐渐黑了，刘兴伟背靠在值班室门口，准备就在这里对付一宿，被防洪值班的一个干部发现。于是，他被领到农机站的仓库。又累又困的他扯下盖机器的苫布往地上一铺，往上一倒就沉入梦乡，带着满脸满身的泥土和满脚的血泡。半夜2点时，他被蚊子咬醒，才发现仓库密不透风，闷热得像个大火笼。

53 天里，刘兴伟走过沈大高速公路和铁路。他有那么多理由让自己乘车，下大雨、脚痛、感冒发烧……但他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决不让自己破例。他知道，人生难得几回搏，他不想为这次跋涉抹上一点遗憾的瑕疵。不过，途中也确实坐过一次车。那是 8 月 15 日，在吉黑两省交界的拉林河，当时已是晚上 6 点，大雨滂沱，而国道边一个人家没有，他只好走进黑龙江武陵交警中队希望能得到帮助。但中队长坚持国道上不能留宿外人的规定，即便他提出绑上自己的要求也不松口。不过，中队长心眼不错，主动提议开交警巡逻车送他到前面的村落投宿。望着丝毫没有停意的大雨和渐浓渐黑的暮色，刘兴伟考虑一会，同意了。翌日清晨，刘兴伟又走进交警中队的值班室，中队长一下子愣住了：“你怎么又回来啦？”刘兴伟微笑着：“我是来谢谢你的帮助的。不过，你把我送出去多远，我还得走回来多远，我不想考察路上留下一点空白。”话音刚落，中队长已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

三、遭遇与帮助

对刘兴伟而言，皮肉之苦并不可怕，流氓袭扰却很麻烦。7 月 11 日，辽宁大石桥，刘兴伟被 4 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拦住了。他们见他胡子拉茬，误以为是外地民工，就围过来翻他的书包，拿起他的证件还恶言嘲弄，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交涉，这些人才放过他，走时还恶狠狠地甩下一句：“以后，别在这地界乱撞！”

为了减少麻烦，刘兴伟连夜赶制了一条授带，绣上“政法学子独步哈大”八个赫然大字，披挂在肩上，这以后果然风平浪静。谁知 8 月 17 日，在黑龙江双城市郊，10 来个酒气熏天的小青年截住他，这伙人硬说刘兴伟是什么“在逃杀人犯”，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刘兴伟压抑住内心的恐惧，镇定地说：“我刚好要到公安局调查，你们把我送去吧。要是杀人犯，就算我投案自首，要真是调查，也是你们在做好事。要看证件，到了公安局再说！”这伙流氓纠缠了一会儿见没便宜可占，才悻悻地走了。看着他们的影子消失在街口，刘兴伟才感到脸上布满了紧张的汗水。

冷遇也让人难受，这一路，刘兴伟碰上过好几次官僚作风。6 月 30 日，他想和东北财大法律系的学子在大连搞一次普法宣传活动，找到司法局以求批准。结果，一个上午，从南楼到北楼，楼上楼下，他跑了局长办公室、团委、法宣科等 5 个部门还没解决问题，好不容易公证律师办公室的主任点头，他刚出门又被叫住：“你再跟公安局征求一下意见吧……”刘兴伟愤怒了，他只能走出门捏紧拳头，对空猛打两下以泄心头之愤。

当然，世上还是好人多。在草鞍山旧堡，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请刘兴伟去家作客，他 78 岁的老母亲赶紧关了小卖店，专门上街买菜招待“贵客”。第二天，老太太怕误了刘兴伟赶路，早上 4 点就起床剁馅包饺子；在铁岭腰堡，饭店女老板听了刘兴伟的介绍，回头冲她的弟弟喊：“你要有这位哥哥的毅力，早考上高中了！”紧接着，她又要给刘添几个菜，刘以为是生意人的客套连连推辞，老板爽朗地笑笑：“大兄弟，你吃啥就点啥，这顿饭大姐不收钱了……”；在石家村，村长不在，刘兴伟把证件交给村长的妻子验证，女主人摆摆手说她识字还是等村长回来再看。当端上热腾腾的饭菜，女主人招呼他一起来吃，刘说：“大姨，您没看证件，不怕我是骗子。”女主人笑了：“家有剩饭，路有饥人，走到哪能没口饭给你吃？”

一路上，刘兴伟常常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样的亲情与关怀。最

让他感动的是在吉林省德惠县沃皮乡新华村邵家屯，这里的人们从吉林电视台新闻五分钟节目中得知他的事迹，热情地把他拥到村长家，男女老少问长问短，夜半才散。躺在女主人新换的待客用的新床单、新被褥上，刘兴伟倒头便睡。深夜，他忽然被村长两口子的谈话声惊醒，当听到女主人说：“孩子他爸，明早你借2斤大米去吧。城里人怕吃不惯玉米饼子哩。”他的眼睛湿润了——多么淳朴的民风，多么诚挚的感情！第二天，他起个大早，帮屯长家打扫院子，挑水劈柴以酬谢这份厚意。吃完早饭后，全村老少都来送他，他和那些连相机都很少见过的农民拍了整整一卷胶卷，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这片热土，踏上新的征程。

四、收获

2000年里路上，刘兴伟5进高校作报告，在东北财经大学，还有人怀疑他能否坚持走完全程；在辽阳外语师专，他赢得了如雷的掌声；在铁岭师专，人们纷纷来找他谈心，一位女同学还拿出精美的日记本让他签名题诗……他两进军营，先后向四平和哈尔滨驻地部队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在大连和铁岭，他两度与政法学子联手，开展大规模的法律咨询和宣传法律知识，散发了5000余份“二五”普法材料。用脚丈量土地的同时，他还拍摄了11卷胶卷，写下5万字的采访笔录和15万字的考察日记。开学返校后，迎接他的，又是法律系优秀实践生的荣耀。

刘兴伟引起了舆论界的关注，他的声音，出现在辽宁广播电台的“开心都市”节目和吉林94东北音乐台的“伴你同行”节目中；他的身影出现在开原、吉林、黑龙江三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和铁岭电视台的“青春风采”专题里；他的事迹还被《中国青年报》、《黑龙江法制报》、《吉林法制报》、《辽宁青年报》等10余家报社刊载。

影响不仅这些，在沈阳市北郊，一位中年人和他攀谈后非要邀请他吃晚饭，席间，他告诉刘兴伟，这两年挣了几十万却总觉得心里缺点东西，“今天见到你这样电视上才有的伟大的人，算让我彻底服了，人光有钱还不行，得有点精神，有点追求……”此外，刘兴伟已数不清，有多少人感慨他帮助自己实现的年少时的梦想；又有多少雪片般的来信为他的举动喝采，还有多少莘莘学子以他为帆，也要开始青春不同凡响的远航……

辉煌已成为历史。对刘兴伟而言，人生旅程刚刚写过二十二岁的年轮，他还要走下去，带着一路收获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带着正面现实的勇气和改造世界的豪情，带着二千里路云和月啊，向未来坚定地走去。

地平线上，是他傲岸的背影……

一名特困生支撑起另一名特困生的大学梦

特困生，一个期待社会关注、帮助的集体，一个来自贫困家庭，而又渴望知识、渴望成材的当代大学中的特殊的部落。众所周知，在得不到社会赞助的情况下，一个特困生靠打工维持自己的学业都很困难，何谈帮助别人？然而，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特困生冯圣兵，却把自己拼命打工挣来的仅够自己学业的血汗钱节省出一部分，救助一位素不相识的、一学期仅靠 14 公斤粮食生活的极端贫困的女孩高敬霞，帮助她读完了初中和高中，最终考入大学。

5 年间，曾有 4 名家境较宽裕的同学想和他一起救助高敬霞，但坚持了几个月，就都退却了，只剩下家境最困难的冯圣兵一个人。也许同样是出身贫寒，才使冯圣兵理解了高敬霞那颗渴望读书的心；也许还由于自己在逆境中自强不息，才最终考入了大学，冯圣兵坚信逆境中的高敬霞也一定会成材。冯圣兵从自己的口中省出钱来，给高敬霞寄去，坚持了整整 5 年……

高敬霞和冯圣兵艰难的求学之路催人泪下，冯圣兵勒紧腰带，救助高敬霞的义举更是感人至深。

靠打工维持学业

1994 年 9 月，家在鄂西北郧县一个偏僻山沟里的穷苦孩子冯圣兵，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带回家里。终日默默劳作已驼背的父亲，和即使生病也舍不得花钱买药的母亲，激动地把那张薄薄的通知书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这张通知书实在来之不易啊！为了考学，冯圣兵一家人吃的苦简直无法形容。家里太穷了，地里的收获仅能勉强维持着吃饱饭，别的只有靠割龙须草卖给当地的造纸厂，才能有一点点儿额外收入。贫穷，像一座无法推开的大山，一直压着冯圣兵一家。冯圣兵读高中时，是学校里吃得最差，穿得最破的学生，可学习成绩却非常出色。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品学兼优的他在所有的志愿表中都填了师范学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师范院校收费较低。尽管如此，开学要交 1090 元的学杂费（这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够少的了），这可让冯家犯了很大的愁。卖了些口粮，父亲又跑了 3 天，从亲戚和邻居那里东挪西借，才总算凑足了学费。

临别时，冯圣兵望着站台上父亲那在风中浮动的灰发，哽咽着安慰道：“爸爸，放心吧！我有一双手呢。到了学校，我就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挣钱，供自己上学”

到校的第一天，他便报名接受了学校为特困生提供的“工作”——打扫校园卫生。于是，同学们每天都能看到 he 拿到扫帚和撮子，在认真地扫着。

可是这项“工作”每月的收入只有几十元，连最低的生活标准也难以维持。冯圣兵又找了份卖报的差事，每天天不亮，他便起床，赶紧取报纸，迎着晨曦中的人流大声地吆喝起来。卖报实在太辛苦了，一份报只能赚一两角钱，甚至只有几分钱。为了节省时间，他不能去食堂吃早饭，经常是兜里揣着两个馒头，一包榨菜，对付对付就是一顿饭。

有一天早晨，外面下着很大的雨，同寝室的同学都劝他休息一天，他说什么也不肯，抓起雨披就钻进雨帘。那天，尽管被雨淋得裤角和鞋都湿透了，

冻得他直打颤。可想到挣了钱，他还是很欣慰的。

后来，他又找了一份家教工作，辅导一名初中生数理化，经常很晚才能回校。

他从不耽误一节课，又要做那么多工作，身体非常疲乏，常常一挨到床上，不管寝室多么吵，都能呼呼入睡。

渐渐地，他靠着辛苦打工，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了，不再向家里要钱。当然，他的生活水准依然是大学校园里最低的，每顿饭他都精打细算，菜要选价格最低的，饭也要最便宜的。午饭和晚饭，他时常是两个馒头就着咸菜，外加一大缸子凉白开。听说邻校的菜能便宜一、两毛钱，他便舍近求远地跑到那儿去买菜。他的一件从旧衣摊上花 10 元钱买的上衣，宝贝似地不分季节地穿在身上。他的一个本子两面都用过了，还舍不得扔，还要用来练字。他喜欢读书，好几次，在书店里碰列他渴望已久的书，他长时间地抚摸着，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因为他口袋里的钱太少了。学院运动会上，他报了万米长跑。一直跑在前面的他，快到终点时，突然扑倒在地，好一会儿才醒过来。长期的营养不良，已严重地影响了他的体质，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在这样艰难拮据的生活条件下，冯圣兵还要从口中，从其它方面，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省出一部分钱来，救助一位素不相识的，贫穷得在今日已近乎“天方夜谭”的特困生，而且他已整整地坚持了 5 年。他所做的一切，在大学期间一直是在秘密地进行着，直到最近《中国青年报》的一位记者写的一则短讯见诸报端，人们才了解了一点儿的真相。

伸出援助的双手

那是 5 年前，冯圣兵还在郟阳县中学读高一，在为纪念“世界粮食日”而举行的一次“节约粮食”的主题班会上，班长王龙向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湖北丹江口市习家店有位叫高敬霞的女孩，家中四壁空空，一贫如洗，可她偏偏喜欢读书，说什么也不肯辍学。她一学期全靠 14 公斤粮食生活，几乎平均两天才能喝上一顿稀粥……

听到这些，冯圣兵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哦，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困难的了，原来还有比自己更困难的呢。他摸着膝盖上补丁的双手攥紧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撞击着他年轻的心扉：我一定要帮助她，绝不能让她因贫困而失学！

班会结束后，他立刻找到班长，又详细地了解了高敬霞的情况，连夜给她写信，鼓励她战胜困难，坚持求学，同时还寄去 20 斤粮票。

很快，高敬霞回信了，那是一封催人泪下的回信，信中这样描述了她那叫人难以置信的而又实实在在的困境：

地少，天又旱，父母体弱多病，全家最好的年景收入不足 300 元。她寄宿在学校，每学期仅靠 14 公斤粮食生活（注意，是每学期仅有 14 公斤粮食啊）。每到开饭的时候，同学们飞快地奔向食堂，她却总是磨磨蹭蹭地落在后面，趁大家不注意，溜到校园附近的小树林里躲起来。饿极了，扯起一把野菜就往嘴里塞。等同学们都吃完了，她才羞涩地回去。每两天，她才悄悄地煮一碗稀粥。那放了许多水的稀粥，喝得她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中的肠胃咕咕直响。每次喝粥，她都要留一点儿，以便下次兑一些水，再糊弄一下肚子。她的碗无需要再洗，因为她早已反复冲洗喝净了。至于美美地吃上一顿干饭，

那实在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她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想煮点稀粥，可米袋早已没有一粒米了。外面寒风凛凛，雪花飞舞，她再也忍不住饥肠如鼓的折磨了，衣着单薄的她踉踉跄跄地赶了几里山路，回家找了两个生地瓜，囫囵吞枣地吃下去，又匆匆地连夜返回学校……

冯圣兵读着高敬霞的信，心在颤抖，手下意识地伸进衣袋里，摸出带着体温的这个月的生活费仔细地数了一下，只有32元5角，而一个月才过了一周，这点儿钱他还要对付3个多星期呢。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从中抽出10元，给高敬霞寄去。同时他又在班级里动员了另外4位家境较好一些的同学，组成了一个5人“救助小组”，商量好每人每月拿出10元钱，一起来帮助高敬霞，但有的同学只坚持了几个月，便不干了。1年后，只剩下家境最困难的冯圣兵一个人还在坚持着给高敬霞寄钱。

冯圣兵知道，眼下自己家中也相当困难，指望割龙须草卖钱是越来越困难了。他只能从可怜的伙食费中再绞尽脑汁地节省，另外再利用周末休息，拾破烂儿换点钱，来资助比他更困难的高敬霞。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再不去关心她，她可能很快就要失去读书的机会。

面对高敬霞的凄寒的家境，村里很多人都劝她别念书了，还是辍学回家干活吧。父亲也无奈地劝她，她也曾几次动摇，可是一拿起冯圣兵充满鼓励的信，她就仿佛看到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那样一个坚定的声音就在她在耳旁的响起——无论生活多么苦，都要读书、读书、读书……

她忍着生活的艰难，读完了初中，又读高中。冯圣兵寄来的钱虽然十分微薄，可给她的帮助却很大。她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

绝不能让她失学

屋漏偏逢阴雨。去年，高敬霞的弟弟从树上摔下来，家里凡是能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又四处借了2000多元，才算把弟弟的伤治好了。

沉重的债务，对她那本已贫困不堪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此时她还有半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当她无奈地选择辍学时，她在家中整整哭了3天。她不知道怎样向始终默默地关心和帮助自己4年半之久的冯圣兵，讲述命运的不公和内心的巨大痛苦。

从春节前一个月到新学期开学，冯圣兵一直未收到高敬霞的信，他预感情况有些不妙。在返校的途中，他绕道数百里，赶到高敬霞就读的习家店中学。

一打听，不知她什么原因没来上学。冯圣兵心里一沉，他赶紧问明她家的地址，要亲自赶去问她为什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放弃了读书。当时已是黄昏时分，他匆匆地乘车直奔高家。车至篙坪，便不再往前开了，而这里距离她家尚有20多公里路程。他心里太着急了，没有车，他就沿着公路步行前往。幸好路上碰到多年未见面的高中同学王龙，王龙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于半夜时赶到了高家。

高敬霞怎么也没想到，心中感激不尽的恩人冯圣兵会突然出现在眼前。而高敬霞家的贫穷、寒碜，更是远远地超过了冯圣兵的想像：两间破旧低矮的草房阴暗、潮湿，屋里除了一个很小的旧木柜以外，没有任何家具，连他坐的凳子也是刚从邻居家借来的。

看到这一切，再望着书信交往了4年多瘦弱的高敬霞，冯圣兵的眼睛湿润了。什么都无需要再问了，眼前的情景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急于知道

的一切。

临走时，冯圣兵留下 50 元的路费，将余下的 200 元钱全都塞进了高敬霞的手里，然后，不容拒绝地叮嘱道：“一定要参加高考，再大的困难有我呢，我会全力帮助你……”

“恩人啊！”对着冯圣兵远去的背影，泪如雨下的高敬霞长鞠一躬。

冯圣兵返校不久，便收到了高敬霞的信。她在信中写道：“你的深恩，我将终生不忘。今后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也不再辍学了，一定要考上大学……”

冯圣兵放心了，赶紧将打工挣来的钱寄给她，并安慰她：“你只管好好地读书，我尽一点儿微薄的力量帮你，决不是为了要你报答什么。”

是啊，5 年来，饱经生活艰辛的冯圣兵，拼命地打工赚钱，节衣缩食地支撑自己的学业，还不间断地帮助非亲非故的高敬霞，他何曾想过丝毫的回报呢？他只是想用自己拳拳之心，来温暖另一颗不甘命运安排的心灵。

去年 9 月，郟阳师专的录取通知书，令高敬霞一家人幸福地哭抱成一团。拿到通知书，高敬霞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赶紧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方一直关心自己的冯圣兵。

虽然数千元的学费对于高家来说，仍是一座很难翻越的大山，但是屡经磨难的高敬霞，已下定决心，就是贷款、打工，也要完成学业，决不放弃这人生难得的学习机会……

是的，特困生冯圣兵和特困生高敬霞两个人今后的求学之路，依然困难重重，但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逆境会把他们的意志磨炼得更加坚强，为着心中缤纷的梦幻，他们会咬紧牙关，把所有的苦难都踩在脚下，会用顽强和执著继续书写人生的悲壮与辉煌！

43 名大学生与一位乡企老板

都说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精明、现实，挑工作首先要看待遇，可 43 名 95、96 届的“傻冒”，不少还揣着优秀毕业生的红本本，却选择了浙南山区的一家乡镇企业。

这个山沟沟名叫大战乡，位于浙南小县仙居的一个偏僻角落，唯一通往县城的土路也很少尘土飞扬。这儿的青壮年大多数天南海北地出门找机会，所以，一下子来了 40 多名大学生，新疆口音、四川口音、山西口音，五湖四海的，特引人注目。

“天之骄子”上山下乡，而且成团队式的，确实成了当地一大新闻。这个县城 1000 多家乡镇企业，总共才 50 多名大学生，却有 90% 落户在这一家——仙居制药三分厂。

大学生们对“上山下乡”的解释只有一个：这儿有奔头。

我需要的是事业

浙江大学 95 届优秀毕业生曹克林，原本可以在大城市找到一份既体面又实惠的工作，他却选择了这里。那是毕业前，他被厂家请到这山沟沟一游，满目的简陋令他打起了退堂鼓。老板问他有何要求，曹克林试探性地提出：能否添置一台高效液相检测仪？

这台检测仪市价至少 18 万元，对于这家老板上班还骑车翻山越岭的乡企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又是一位“乳臭未干”的大学生“狮子大开口”呢。

没想到，老板马上就问：买美国产的还是日本产的？你来选！

曹克林说，他就在那一刻下定决心的。

进了厂里，勤奋又敬业的曹克林很快成为骨干，不久又被提升为车间主任。工作不到半年，曹克林有 5 项科研成果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这一年多来，他的科研成果总效益将近 400 万元，几乎每周都有改进和创新。仅消旋工艺改革一项，年效益可达 150 万元以上。

曹克林认为，这里就像是研究生院，不仅有条件钻研新项目，而且还能学以致用。而此时，他的大多数同学也许还在办公室里谨小慎微地等待见习期满转正呢。

曹克林“上山”，放弃了进城的“绿卡”；而蒋邦武“下乡”，不仅辞去了公职，还承受女友分手、父母断情的沉重代价。

这位华东化工大学的高材生，95 年毕业分配到攀枝花钢铁公司某研究所。这里条件好、待遇好，对于一个农家子弟而言，已相当不错了。然而不久，蒋邦武就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这个研究所“论资排辈”的结果，居然是新来者为“前辈们”放哨，而“前辈们”则公然在上班时间聚在实验室内打扑克。

经同学引荐，蒋邦武毅然辞职，来到了仙居。也许农家孩子太屈，他事先没和女友、父母商量一声。于是女友来信：你走你的路吧。父母说：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回家来我们也不认！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毕竟我是老家十里八庄第一个考进重点大学的。可我需要的不是安逸，而是事业啊！”

如今，蒋邦武果真在事业上“小”有所成：先任酰化车间主任，后担当

技术科负责人，并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改造了酰化工艺，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每天可达1万元！

财迷老板

43名大学生奔赴山沟沟，并将事业定格在这里，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他们的老板陈世干。

有句话时常挂在老板的嘴上：谁说当代大学生不如50年代的？我看是一代胜过一代。学业上如此，思想观念上更加先进开放。关键是要为他们创造人尽其才的环境！

而吸引大学生们从天南地北齐集这个山沟沟的，也正是这个乡企的环境。

老板是个老知青，厂子就是他领了一班知青创办出来的，初衷很单纯：只是想证明知青能自食其力。老板做大了，却依然朴素得像个农民。常年身着一件工作服，在车间里钻进钻出，手指甲也被化学试剂腐蚀得变了形，一头短发时常乱糟糟的。

武汉大学毕业的税典红见识过无数企业家，最终选择了这里。他说：“哪个企业家像我们老板一样，连自己的工资都要经过民主评议的？”

这里的民主气氛更令人感觉像在校园。大学生曾公开贴过大字报：厂长最近在忙什么？怎么见不到了？刚刚跑业务回来的老板连夜赶到宿舍，接受批评。次日就挂出了“厂长意见箱”，钥匙仅由他一人掌管。

有人说他“财迷”，比如他今年买了辆桑塔纳供上下班；而有一次青工们还在报纸上讨论老板究竟有无西装。

也有人说他其实是“财迷”，因为他在引进、培养人才上总是一掷千金。除了对科研人员购置设备器材的要求有求必应外，他还每年花费10万多元让全厂青年进课堂。不久前，老板又在县城黄金地段买了一幢5层大楼，除底层用于办公外，其余均作为大学生宿舍，每天用中巴车接送。

今年4月，老板邀请了上海、浙江的60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考察。事先，老板原原本本地讲了条件如何如何艰苦，然而4天之后，60多人竟齐刷刷地要求进厂。老板几乎是哽咽着说：一时无法全部接纳。分手之际，大学生们抑制不住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们说，4年中除了军训结束时哭过外，只有这一次是被深深感动了。

几乎进厂的每一个大学生，都能给你讲一个被老板“三顾茅庐”的故事。每次到上海、北京、杭州，老板宴请的鲜有达官显贵，而是“一无所有”的大学生。一次次坦诚的相见，先讲艰苦、困难的条件，再讲光明、希望的未来，令不少大学生迸发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朴素情感。

除了大学生，老板还特意引进了不少高考落榜生。吴林树，一位安徽落榜生，在这里打工3个月，感觉是学了3个月，“找到我的大学了。”他的班主任闻讯后，领了14个高考落榜生，千里迢迢赶来，非要老板收下不可。

老板说：“我也是高考落榜生，我相信这种挫折是一笔财富。”

厂里办起了电大班。在厂部门口，与厂牌并排而立的是电大教学点的牌子，加上楼顶的天线，乍一看就像一所学校。老板不单请来上海、杭州等地的教授给青工上课，有时甚至还让大学生们走上讲台。老板心里有一个目标：要让一半以上的青工获得大专以上的学历。

乡企大学生风采

这么一个群体，所产生的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是足以令不少教育工作者嫉妒的。

在宿舍里，最不屑于口号的大学生们自发贴上了这样的标语：“为了中华的腾飞”、“这里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他们自发组织了“公关俱乐部”这类准团委组织，经常探讨如何在乡企中建功立业，如何让企业上规模、上档次，青年攻关小组、厂报等等都是他们的杰作。今年“五四”，企业正式建团，这个团委立时成了当地经费最充足、权力最大的团组织，干部的升迁任免必须听取团委的意见。

在这里，每个大学生都是和一些数字紧紧相连的：节省了多少成本，创了多少利润、出了多少科研成果

走近戈壁军营

巴丹吉林沙漠西沿，弱水河畔，响彻环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的第一座航天城，便矗立在这曾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生命禁区”的茫茫戈壁滩中。

7月21日，位于航天城的空军某部试验基地来了一批大学生，这是北京师范大学“青年共产主义者培训班”社会实践队成员：党委青年部副部长聂振伟老师和经过严格选拔的9名同学：王毅、于海飞、卫云、李素、李莹、里刚、何瑶、郭睿、魏方玉。他们将要到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社会考察。

当我们冒着戈壁滩毒辣的日头参观了全军一流的指挥控制大厅，全国唯一能起降航天飞机的机场，曾经发射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架，世界领先的无人靶机等等奇迹以后，我们迫切希望走近这一群创造奇迹的人。我们与基地的英模座谈，听赵煦、林伟东等优秀科研知识分子讲他们致力于科研，研制出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无人驾驶飞机的先进事迹。我们与基地老师交流，听全国优秀教师羊秀娥讲她们又当园丁，又当军嫂的感人故事。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我们经常边流泪边听报告。我们还邀请打弹大王齐宝成到我们的住处，讲他的妻子和孩子，讲他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走访了基地吴卉老师的家，跟他们聊起“特殊”的家常。确实，在那里要了解的人和事太多了，我们抓住每个机会，在车上，在参观中，在休息时，走近他们，挖掘到许多他们习以为常而对我们却是如此不平凡的故事。

一、父亲的故事

在这次社会实践队中，李素同学算是个比较特殊的成员。相对于其他人，她对戈壁滩的军人有着更深切的感情。因为她是一名军人的女儿，她的父亲就一直在这戈壁滩上工作着，生活着。军营，是她童年的摇篮。

在西行的列车上，面对同伴们探寻的目光，李素同学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她父母的故事——记得小时候，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总是有两个场景异常清晰：那是一天下午，我从外面跑回家，见院里有一个黝黑壮实的人在洗脸，妈妈在一边笑咪咪地递给他毛巾。我很奇怪，不知这人是谁，妈妈告诉我这是“爸爸”，尽管幼小的心中模糊地觉得“爸爸”是个很亲切的词，可我还是躲到了妈妈身后。另一个就是我和妈妈在火车上，爸爸和很多叔叔在下面，我当时很着急，因为火车就要开了，我怕爸爸被落在下面，大声喊他，可他只是笑着向我挥挥手。车徐徐开动了，爸爸却没有一点上车的意思，我当时还不懂这就叫做分离……

后来，终于可以和爸爸在一起了，已经上了小学初谙世事的我很快发现，这儿与冀中平原家乡的不同：那西北大漠干燥的气候和那十几个人一班的小学校。我也见到了家属临时来队时简陋的生活设施和那些因随军家属没处安置而不得不养鸡、种菜、扫大街的阿姨们。但依旧幼稚的我，从未考虑过这是否合情合理，更谈不上赞美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这些家家都可能出现的场景，只不过是童年记忆里留下的一两道划痕而已。

但我毕竟曾目睹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支撑起这风雨飘摇的家，也曾品味过缺少父爱造成的苦涩和寂寞。随着年龄的增长，心中固有的那份早已习以为常的情感渐渐地模糊起来。我开始觉得，这世界很不公平，为什么别人可以经常和父亲上公园划船，而我一年才见一次面的父亲还常常提前归

队；更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和其他军人们能无怨无悔地做出这一切。直至上大学，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终于发现，和蔼的父亲心里充满的是对祖国、对军队、对家庭深沉而真挚的爱。

二、“小点儿”的故事

感触最深的是在“小点儿”。去基地，就得去小点儿，那是一些广布在戈壁深处的飞机导航站、观测站，自然条件非常艰苦。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基地的首长安排我们去了南 6000 的小点儿。在那里，我们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呆了整整一个下午。因为那儿常年只有 6 名战士，不管环境是多么的恶劣，生活又是多么的寂寞，他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和我们同龄，他们却选择了戈壁，选择了默默无闻赤诚的奉献。

当我们走进一个小点儿，眼前却闪现出一道道绿色。在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种树比养活人还难的戈壁滩中，战士们用自己的双手种上了一棵棵高大的胡杨树，还开垦了一块仅有 2 平方米的菜地。他们把这点点绿色视为他们最得意的成功之作，于是我们走上前去，细细品味这不同寻常的绿色。我们的一位队员见菜畦中有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便好心地把它拔了出来，不料一个战士却马上发生叹息；“哎呀！”声音里分明含着几分责备。班长张月明告诉我们：“在这一片净是黄土、沙砾的戈壁滩上，战士们种树种菜为的就是能看上这一点儿绿色。这棵小草长在这片菜地里已有多月，大家看着它长起来，却没有人舍得将它拔掉。要知道在我们这里，能见到一点儿绿色是多么不容易呀！”班长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心里沉甸甸的，真没有想到这一棵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小草竟牵动着战士们的心，也从此牵动着我们的心。因为，绿色，在戈壁战士的心中，是希望，更是生命的象征。

在小点儿，我们还听到一个一把青菜的故事：小点儿的一位指导员陈武辉作为优秀干部被推荐到外地的一所学校学习。一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民工背着一根长长的铁棍，眼看就要触到电线了，他大步上前，一把推开那个民工，自己却触电身亡了。他牺牲后，部队同志到家里去慰问，却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妻子最理解丈夫的苦，只在他的墓前放上了一把青菜，面对丈夫的遗像，她深情地说：戈壁滩缺水，你生前很少吃得上青菜，这把菜留在这里，你慢慢地享用一次吧！

小点儿上一名不到 20 岁的小战士陈立拿是主动要求到西北荒漠来的。两年前，他作为江南水乡的新兵在甘肃集训，那里条件已经很艰苦了。分配的时候，他对领导说：“还有没有比这儿更苦的地方？哪儿最苦我到哪儿去。”于是，他来到这茫茫戈壁滩中的一个小点儿。问及他当时的想法，他只是说：“要是这样的苦我都能吃得下，那我这辈子就没有什么苦是吃不得的了。”

三、两位教官的故事

我们在基地见到了很多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和航天事业的佼佼者，其中印象很深的有两位：林小江上校和林卫东中校。他们的业绩是骄人的：43 岁的林小江上校曾经先后参与了“东方红”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澳星、瑞星、潜艇发射火箭等的研制工作将近 70 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经历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最重要的阶段”。林卫东中校是基地青年科研人员中的楷模，他参与研制的超音速无人靶机在今年 4 月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在此领域的空白。当年，年仅 28 岁的他便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可同大多数基地官兵

一样，这些显赫的功绩背后，有他本人和家庭作出的巨大牺牲。可以说，这些成就是用超量的代价换来的。

林小江上校历经了多次感情的波折，姑娘们跟他分手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在大西北工作”，直到33岁那年，他才获得了纯洁的爱情。可善良的妻子却没有力量给他足够的关怀和爱护——迫于工作，他和北京的妻子、孩子一直分居两地；在婚后的11年中，上校算了算，“和妻子共处还不到1年”！他不是没有资格享受家庭的安逸——他先后3次自愿放弃了调回北京工作的机会。他丢不下挚爱的航天事业，他深深地眷恋那片升腾起他理想的苍茫戈壁！从1969年林小江上校参军入队到现在，他已在艰苦的大西北奋斗了整整26个年头！这是曾经令到基地参观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瞠目结舌的一个数字。林小江上校的父母都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英雄的家庭遗传给他英雄的气魄：“人，就是不能给自己留太多的退路！”

林卫东中校的一句话“并无压力不喷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一直被我们奉为名言。他把对祖国对人民最诚挚的情最深厚的爱，化作了言行点滴中的责任感，化作了处世为人的基本美德，鼓舞和激励自己在戈壁滩上兢兢业业了近14年。这位从小立志继承父亲的职业，作一名真正的军人的汉子，在大学毕业志愿书上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我的第一志愿是到部队，第二志愿还是到部队，好男儿志在四方。”虽然他也有过“火车过了兰州，路越走越荒凉，心也越走越凉”的酸楚往事，但他终究挺过了重要的考验，并且取得了优于常人的成绩。因为他觉得：“国家培养一名大学生花了很多钱，就算是作为人的良心，应该知恩图报。到了工作岗位，拿着国家的钱，吃着军队的饭，不踏踏实实地做出点儿什么，问心有愧，于心不安呀！”

在基地，我们时常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很多话从军人的口中说出来，便显得格外的真挚和朴实，令人信服。

四、园丁的故事

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发现，军营里不只有军人，还有一些老师。她们是部分军官的家属，来军营后便负担起了军营子女的教育，军营的孩子从此有了自己的老师，她们的肩上有着双重任务，为国防、为教育。

1958年，刚建基地，没有学校，二十几年后方有今天的规模：学前、小学、初中。在基地上曾有过高中，后因师资不足而消失了，基地孩子上高中就只好到外面的酒泉中学或一些乡级高中等住宿读书。

而基地的老师，她们大都来自大中城市，为支持丈夫的事业而心许戈壁滩。丈夫每周回家一次，日常家务、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她们不担谁来担！在家务缠身的情况下，她们还肩负着培养基地下一代的重任。

基地的孩子们虽人数不多，但各年龄层次都有，所以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这就使得老师不可能只教一门课，往往得教不同年级的不同科目，工作量要比城市学校的老师大得多。而且相互之间代课也不容易，所以带病坚持上课是习以为常的事。

吴老师的父亲是原基地的政委，病故时已离休回到大城市，他留下遗嘱，要心爱的女儿带着他的骨灰重返基地，并希望女儿在基地安家落户。女儿遵照父亲的遗愿，嫁给了一位基地军人。昔日的小姑娘已人到中年。吴老师深情地说，“我在这里工作了近20年，我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戈壁滩上的教育事业。我认为我的青春是无悔的，一生也是无悔的，我热爱

这片神奇的土地，更愿将我全部的爱奉献给戈壁滩上的孩子们。”

大漠深处有军人，我们至今忆念那落日渲染下的大漠，忆念那干涸沙隙中倔强挺立的骆驼刺草，为那丛跳跃在“生命禁区”的国防绿，为我们沙砾般朴实的父兄写下了这些文字，只因我们曾经走近戈壁军人！

